

历史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民的社会情绪

王晓菊

【内容提要】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苏俄农民总体上改变了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形成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消极态度，社会情绪初步改善。然而，农民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固。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税赋沉重、不合理的价格政策及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等原因，广大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发生逆转。到新经济政策末期，农民的不满情绪再度激化，在相当程度上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 苏维埃政权 农民 社会情绪 粮食税

【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6-0043-0006

为了赢得国内战争胜利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于1918年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余粮收集制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它规定农民向国家义务缴纳全部余粮和超出个人消费规定标准之外的其他农产品。1921年年初，战火虽已基本平息，苏维埃政权却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①。由于对余粮收集制的强烈不满，坦波夫省、沃罗涅什省和西西伯利亚等地的农民掀起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2月28日至3月18日，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兵（“穿着军装的农民”）发动大规模起义。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决定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新经济政策。本文运用近些年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试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的社会情绪问题加以探讨。

了关于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历史性决议。3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法令，其中的主要内容有：粮食税的税额应低于余粮收集制时的税额，并随着运输业和工业的逐步恢复而不断降低；粮食税的税额根据农户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对贫困户可以减免，对恢复农业生产得力的农户以减税作为奖励；在春耕前公布税额，以刺激农民增产增收；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剩余的全部粮食、原料和饲料。总的来看，粮食税的实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正如列宁在1921年年底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总的说来，粮食税减轻了全体农民的负担。这是用不着证明的。问题不仅在于拿了农民多少粮食，而且在于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觉得心里更有数了，经营的兴趣提高了。”^②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

①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②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0页。

【作者简介】王晓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项目号：11FSS001）阶段性成果。

1922年,新经济政策在一些粮食主产区初见成效。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关心,对苏维埃政权抱有好奇。特别是人民委员会颁布偿还种子贷款的优惠政策以后,农民们更加确信,苏维埃政权在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地方政府竭尽全力地满足农民的需求,如彼尔姆省、辛姆比尔斯克省临时或最终免除了农民的蛋税和油税,有些地方在农忙时节还免除了劳力畜力税。根据苏俄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资料,这一年伏尔加河流域打着政治口号的大规模起义偃旗息鼓,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抢劫行动。起义队伍的反共号召不再吸引农民的注意力。一方面,可怕的饥荒使农民不可能对起义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农民也不愿意支持起义,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从春播到秋收,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不仅积极地投入生产劳动,而且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明显好转,这一情况成为伏尔加河地区政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从全国范围看,新经济政策也很快给农业生产带来了积极成果。1922年,苏维埃俄国的粮食总产量显著增加,远远超过了1920年和1921年的水平^①。与此同时,按粮食税征收的粮食数量大大减少,农民有了一些可自由支配的粮食。广大农民的社会情绪总体上朝着良好的方向转变。然而,受大饥荒、宗教行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新经济政策实施初期,农民的社会情绪又呈现不小的波动。

1922年年初,由于面临大饥荒,各地农民普遍存在悲观、沮丧的情绪。农民采取了相当激烈的行动。西伯利亚农民的暴力行动有时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农民们希望扩大播种面积,但役畜、农具、劳动力不足,最无奈的是缺少种子,因为种子储备被用作了口粮和饲料。饥荒地区不断扩大,饥民人数与日俱增,饥民的情绪陷入绝望。但是,各地的农民骚动和不满均不带有政治性质。2月,苏俄政府发布了没收教会财产的命令。没收教会贵重品是极富政治色彩的行动,目的之一是获取进口粮食所需要的资金,以赈济灾民。没收教会财产行动从准备阶段转入实施阶段后,教会的反抗日甚一日。受其影响,农民们也宣泄内心的不满情绪,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达到拒不执行政府命令、武装反抗当局的程度。

5~6月,农民的情绪出现转变,有两方面的

原因:一是农民们因战争、流行性疾病而身心疲惫,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恢复农业生产上;二是由于国内外赈济饥民组织的积极活动,加之许多地方已开始收割庄稼,有些地方新粮食已经下来,覆盖俄罗斯1/3以上区域的大饥荒最终被战胜。西北边疆区的农民因播种面积不足和大部分越冬作物受灾死亡而存在不满情绪,但这种不满情绪并未导致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激进行动。农忙时节,劳力畜力税的征收并不顺利,但是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国家摊派的劳力畜力运输公役相比,农民对征收劳力畜力税的态度要积极得多。在多数情况下,只有殷实的富农分子善待反苏维埃的政党,农村的贫农对俄共(布)抱有同情^②。

进入夏季,各地农民的情绪比较稳定,对待苏维埃政权比较友好。西南边疆区是俄罗斯收成最好的边疆区,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情绪上较为平静。乌克兰农民的情绪出现好转。饥荒的阴影烟消云散,农民关注的是改善经营和扩大播种面积。长期依靠农村生存的匪帮在农民中间失去根基而纷纷散伙。在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省和黑海省,也就是当时保皇党人的巢穴,富农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盘踞在那里的白卫军官、保皇党人仍心怀仇恨。在俄罗斯其他地区,大多数农民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新的教会运动等政治事件毫无兴趣。在西北边疆区和西伯利亚的某些省份,农民们由于气候等因素而产生不满情绪。除了这些地区之外,已着手征收的粮食税没有引起农民的激愤,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税额不高;第二,根据每个农户的具体情况编制纳税名单,这一尝试见到了效果;第三,通过宣传活动逐步向农民解释清楚征收粮食税的意义。另外,苏维埃政权旨在恢复农村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对农民的情绪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措施包括在农民偿还种子贷款方面提供优惠、废除贫农同富农之间条件苛刻的交易契约、帮助一部分地区的饥民购买马匹和农具等等。

进入秋季,征收粮食税成为牵动农村居民社会情绪的中心问题。农民对征收粮食税措施总体上能

^① Яковлев А.Н.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М., 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 2002. С.100.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и др.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Лубянка - 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 гг.) Том 1 Часть 1 1922 г.,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1, С.167-169.

正常对待，无故拒税的情况较少出现，大部分抱怨和不满仅仅是希望降低税额。粮食税的征收之所以比较顺利，首要因素是农民群众的普遍安定，第二个因素是土匪活动大为减少。大多数省份的农民希望在10月1日之前缴纳粮食税，以享受10%的折扣优惠。边疆地区仍是粮食税征收最艰难的地区。吉尔吉斯共和国在征税伊始便发生殴打和杀害征税人员的恶性事件。

到了10月，各地粮食税征收活动进入紧张阶段，农民按10%的折扣优惠自愿缴纳粮食税的期限已过，有关部门开始夺取不愿意缴纳粮食税的那部分农民的粮食。在粮食税压力下，好收成带给农民的稳定情绪变成了满腹的不满。然而，农民情绪低落并不具有政治色彩，不满情绪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以强制手段征收粮食税。10~12月，随着粮食税危机的消退，各地农民的情绪迅速好转。农民群众对俄共（布）的信任进一步增强，俄共（布）对贫农乃至中农的影响继续加强^①。

显而易见，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农民总体上改变了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形成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消极态度，这是在农村地区所能感受到的最大成果。1922年11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农民可能对我们政权的哪一方面工作不满意，他们可能对此有怨言。……但无论如何，全体农民对我们已经完全没有有什么严重的不满了。这是在一年内取得的成就。”^②

二

1923年春，大部分省份的农民将注意力集中在田间劳动和多少令人期待的收成上，对苏维埃政权态度友好。各地富农虽然敌视苏维埃政权，但多数情况下并不公开表露。在边疆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居民较集中的地区，富农和神职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农民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固。由于税赋沉重、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及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等原因，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态度有出现逆转的迹象。

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苏联中央和地方政府对

农村居民的消极情绪迅速做出反应，主要措施是修正农村税收政策，减轻农民税收负担。1923年5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部颁布法令，实行统一农业税。统一农业税是每年根据农户的耕地数量和收成情况向农户征收的单一税赋，以取代先前名目繁多的税种。该法令规定，凡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均须纳税，统一农业税以实物、货币或两者并用的形式征收。在粮食生产仅能满足当地消费的北方和东西伯利亚等地区，统一农业税以货币形式征收。次年6月，苏联政府颁布法令，因缴纳统一农业税而致贫的农民可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

日益尖锐的城乡关系问题使国家最高领导层焦虑不安。1923年沃罗涅什省瓦卢伊斯科县的价格关系反映了中央黑土地地区的价格剪刀差情况：1俄磅^③糖兑换35普特^④黑麦、1.5俄磅鲱鱼——1普特黑麦、1.5俄尺^⑤印花布——1普特黑麦、1升煤油——12~13普特黑麦。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使农民蒙受巨大损失，1923年农民损失约一半的收入^⑥！由于工业品价格的过度上涨和因粮食丰收而造成的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跌，1923年10月苏联爆发了剧烈的工业品销售危机。1923~1924年，政府被迫采取紧急措施，将工业品价格下调23.3%。但实际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始终是新经济政策时期难以克服的严重问题。

1923年秋，苏联相当多的省份经济状况不佳，加之已开始征收统一农业税，农民的经济状况有些恶化。许多省份上年收获的粮食已无剩余，许多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出现在31个省份，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阿尔泰省和远东的4个省份。这些省份的农民因害怕歉收而卖掉牲畜，以储备粮食。西伯利亚与远东的贫困农民希望迁移到其他地区居住。北德维纳省和沃洛格达省的农民也向外迁移。维亚特卡省的农民渴望移居西伯利亚。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失衡，农民的经济状况难以改善，中农和贫农进一步贫困化，富农加紧对他们的奴役。

①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и др.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Лубянка – 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 гг.) Том 1 Часть 1 1922 г., С.487.

② Правда, 15 ноября 1922 г.

③ 1俄磅等于409.5克。

④ 1普特等于16.38千克。

⑤ 1俄尺等于0.71米。

⑥ 转引自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到1923年年底,大多数省份的农民怀有不满情绪,捷列克省、阿穆尔河沿岸省和外贝加尔省的个别乡村甚至发生起义,正在消退的土匪活动也有卷土重来之势。

城乡脱节对农民的社会情绪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农民们在党外群众会议上抱怨说:城市生活恢复到一战前水平是以农村的严重贫困难为代价的;苏维埃政权更关心城市,对农村只是一味地征税,等等。农民的政治诉求明显增强,建立“农会”的意识日益强烈。1924年5~6月,广大贫农因濒临破产而骚动不安。萨拉托夫省的贫农说,“除了贫穷之外,苏维埃政权什么都不会给”。西北省份的贫农说,“苏维埃政权对殷实农民来说是好的”^①。在土地规划过程中,农民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受富农分子的宣传鼓动,农民们对地方当局进行抵抗,甚至殴打警察。奥廖尔省的农民说,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同斯托雷平的政策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赎买土地变成了高额税收。在新粮收获前,没有存粮的贫农只能向富农借粮食和饲料,往往要受富农的奴役。有些村子甚至将全部土地交给邻村的居民耕种,条件是对半分。另外,歉收的威胁引发一股狂热的宗教情绪,各地农民纷纷邀请牧师做祈祷。许多省份的俄共(布)基层组织和乡执委会对此类活动进行了干预,不允许举行宗教游行(如坦波夫省、顿河州等)。神职人员利用农村的情绪,以“神灵显圣”的形式吸引成群结队的朝拜者。科斯特罗马省出现大规模朝拜活动,因为人们传说“圣帕霍米耶”(Святое Пахомие)掘出的水井能神奇地治愈残疾者^②。

1924年秋,在俄罗斯许多产粮区出现歉收的情况下,因过多征税、不合理的价格政策而诱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升温。农村地区到处在传言,列宁的逝世导致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这成为政治骚动的强力催化剂。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秘密报告指出,农民中间的激进情绪在全面、迅猛地增长,各地农民普遍表现出在各级政府中选派代表的政治意识。在当时进行的苏维埃选举中,农民们提出了“自下而上地改选”、“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苏维埃的农民代表和工人代表平均比例”、“享有与工人平等的选举权”等要求。农村居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歧视性政策无比愤慨。与此同时,“宗教热”几乎遍及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这在粮食歉收

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神职人员充分利用这种情绪和歉收的形势,组织大型宗教游行,加强反苏维埃的宣传鼓动。特别是在乌克兰,宗教运动广泛展开,教派和东正教团体越来越多。宗教界的宣传鼓动往往充满政治色彩,如反对共产党员,反对(乌克兰)贫农委员会,反对犹太人等。

农村的社会情绪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24年秋,俄共(布)提出“面向农村”的著名口号,号召国家机关及一般单位和个人更多地关注农村和农民的需求,并着手在农村实行一系列相应措施。农民们对“面向农村”的口号产生浓厚兴趣,尽管他们对其真正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重建苏维埃”(Оживление советов)成为农业改革的中心思想,旨在加强党外农民在地方苏维埃机关中的作用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限。但是,在“面向农村”框架内对农民的让步并没有触动苏维埃机关的形成机制。显然,对于理顺城乡关系、缓和农民情绪来说,“面向农村”的口号实际上无济于事。仅仅过了一年,“面向农村”的路线就不再实行。

1925年1月,苏联中央情报机构向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及组织部提交了《关于农民与工人阶级之间对立的表现》的报告,其中指出:最近几个月一些省委和农民寄来的材料都强调,农村居民对工人和共产党怀有敌意。农民们说,城市居民拥有良好的物质条件,拿着高工资,每天工作8小时,享受社会保险、医疗、学校教育和城市文化资源。农民们特别气愤地表示,许多领导干部拿着丰厚的薪水。他们认为,“城市资源的所有外部表现(汽车、剧院、城里人的贵重衣服)均为共产党员所享用,并以此为根据,明确地谈论党的官僚腐败、党从诚实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群体变成了靠农民养活的最高特权阶层”^③。

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民各阶层的不满情绪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要求减少税收、降低工业品价格等),而且表现在政治方面(要求改变国家的农业政策、创建农会、建立农民党、取消选举权的限制、社会革命党等其他党派的活动合法化)。1925年1月,斯大林在莫斯科省党员会议上指出,

①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и др.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Лубянка – 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 гг.) Том 2, 1924 г., С.103.

② Там же, С.123.

③ Яковлев А.Н.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С.209.

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失去同盟者的危险，农民可能转变成苏维埃制度的积极反对者，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彻底失败”^①。

三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各地农民对政府的价格政策更是怨声载道。沃罗涅什省的农民说：“从前买1件衬衫只需1普特粮食，如今却要4~5普特，买1双长筒靴甚至要15~20普特粮食。”^②托木斯克区的一位中农说：“苏维埃政权搞投机活动：1副手套就要4普特粮食，沙皇时代1副手套只卖25戈比。”^③农产品价格过低无疑给苏联的粮食收购带来巨大隐患。

1927年夏，粮食收购再次出现危机的端倪。1927年年末至1928年年初，苏联历史上有名的“粮食罢工”运动终于爆发。农民们决定把粮食先存放起来，待粮价上涨时卖出。下伏尔加边区巴拉绍夫地区新波克罗夫斯克村的一名富农拥有2000普特粮食（仅交给粮食收购站50普特），做粮食投机生意。他在农民中间说：“只有傻瓜才把粮食白白地交给国家，你们这些男子汉，要把粮食磨成面粉再拿到市场上出售，那样会更好……”这句话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普遍心态。一些富农和富裕农民散布有关政府将采取非常措施、饥荒和战争不可避免等言论，号召农民们把粮食藏起来^④。

“粮食罢工”运动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苏联一些大城市出现了食品脱销断档的情况。政府部门紧急采取凭票证供应食品的办法。1928年许多地区启用粮食供应卡；1929年2月14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实行凭票供应；1928~1929年度，对食油、肉、糖等其他商品也实行了凭票供应。

斯大林将粮食收购危机仅仅归咎于富农的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及小农经济的先天弱点。1928年年初，斯大林亲临西伯利亚产粮区进行农业考察。其间，他建议以“非常措施”解决粮食收购危机，也就是运用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7条，将拒不缴纳余粮的富农绳之以法，强行夺走农民手中的粮食。4月6日至11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主要议题之一是粮食收购问题。6月1日至5日召开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也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此时，苏

联的行政命令体制已基本确立，并被不断地加以运用。在实行“非常措施”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许多过火行为，这一方面严厉打击了富农阶层，另一方面也严重侵犯了广大中农的利益。农民们纷纷抱怨说，“新经济政策正在被废除”，“余粮收集制正在恢复”^⑤，等等。强制性粮食收购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已接近尾声。

1929年1月，粮食收购行动基本结束。从这时起，苏联对有存粮的农民展开清洗。这一行动只是取得了短时间的效果。农民交了粮食，但他们的自我保障来源和本地商品流通也随之减少。粮食定量卡的实行意味着农民们难以从城里购买粮食。同年春，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居民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粮食困境”笼罩着列宁格勒州、中央地区的不少省份、斯摩棱斯克省、乌克兰南部一些地区和远东的许多地区。食品中使用粮食代用品，面粉中添加捣成粉的三叶草根和干的桦树皮、麸子、油粕、燕麦、野豌豆。无数人患上胃病，身体开始肿胀。饿死人现象时有发生，斑疹伤寒四处蔓延。农村的社会形势异常紧张。贫农和贫困化的中农对苏维埃政权所偏爱的城市工人充满怨愤。中农和贫农对那些靠粮食危机发财、到处收购牲畜、签订奴役性借粮契约的殷实农民颇为不满。农民们聚集在区执委会那里，要求分给他们粮食、准许自由买卖、允许派人到粮食多的地方采购粮食。痛打基层苏维埃机关公职人员和粮食分配委员会委员、火烧粮仓、盗窃粮食的事件屡见不鲜^⑥。

早在1927年，大多数农民已将工农联盟的口号看成“虚伪的、欺骗性的宣传”。此前，农民主要对职员表示不满，如他们说“职员不穿带补丁的裤子”、“应取消所有职员的薪水”等等。后来，不少农民开始对工人也表示不满，说“他们得到的很多”、“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但每天只干8小

① Правда, 30 января 1925 г.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и др.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Лубянка – 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 гг.) Том 4 Часть 1 1926 г., С.633.

③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и др.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Лубянка – 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 гг.) Том 4 Часть 2 1926 г., С.716.

④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и др.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Лубянка – 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 гг.) Том 6 1928г., С.576.

⑤ Данилов В.П. и др.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 (б). 1928-1929 гг. Т1. М., МФД: Материк, 2000. С.440.

⑥ Яковлев А. Н.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С.413-414.

时活儿”等等^①。农民认为，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小，受教育机会较多，农民与工人平起平坐的希望只是泡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已蜕化为特权阶层，农民则是二等公民^②。农民写给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苏维埃机关及报纸杂志社的信件表明，农民认为政府的农村政策不公正。他们说：“政权是我们的，权力是你们的。”“让国家把我们的土地拿走，我们像雇佣工人那样工作 8 小时，只要供我们吃穿，不给工资都行。”^③

农民们的上述看法不难理解。新经济政策时期，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及社会保险、退休保障只惠及城里的工人和职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被排除在外。当时，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儿童机构和其他服务设施极其匮乏。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苏联政府在农村地区经常举办“清洁周”、“洗澡周”等活动。再者，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虽明显减轻，他们多方面利益却缺乏保障，尤其是政治利益没有得到保障。苏

联在宣布实行工农联盟的路线之后，没有真正地扩大农村居民的政治权利，如消除苏维埃机关选举中的权利不平等现象等。

20 世纪 20 年代末，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时出现的口号——“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在农村再度流行。农村民众对政府强制征收粮食、对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以及对当地共产党员、贫农委员会和民警机关的专横、酗酒和受贿行为甚为不满，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在一些不保护群众利益的地方，农民的对抗情绪十分强烈。中央工业区、商品性农业省份、西伯利亚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地区。

（责任编辑 靳会新）

① Яковлев А. Н.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С.433.

② Андреа Грациози. Великая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СССР.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крестьяне. 1917-1933.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42.

③ Соколов А.К. Голос народа. Письма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М., РОССПЭН, 1997. С.115-116.

Soviet Peasants' Social Sentiment in the Period of New Economic Policy

WANG Xiaoju

Abstract: After carrying out a new economic policy in 1921, the Soviet peasants generally changed the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Soviet regime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period of communist policy of the war days and their social feeling was initiatively amended.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easants and the Soviet state power were not stable.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1920s, the attitude of the vast numbers of the peasants took turn for the worse, because of heavy taxes, irrational price policy and unfair treatment of them. Until the last stage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the peasants' strong resentment became more acute once again and they turned into a powerful opposition force to some degree.

Key words: new economic policy; Soviet state power; peasant; social sentiment; grain tax